

## 從東三省鼠疫問題看清末的 內政與外交（1910-1911）

吳俊瑩

### 摘要

流行疾病傳染不受國界的限制，因而防疫措施有時不單是內政問題，更牽動外交層面，1910年10月爆發於中國東三省的鼠疫即是一例。面對死亡近6萬人的烈疫，不單是考驗清廷衛生行政能力，又牽涉該如何應付盤據東三省的日、俄勢力。防疫工作原屬衛生行政問題，此時卻因牽涉主權糾葛，讓原屬內政事務的防疫工作提升至國際外交問題，清廷防疫能力良窳與否，將牽動太平洋兩岸的美、日、俄三國勢力在東三省的競逐。清廷中央、外務部甚至東三省總督錫良皆深切體認這場鼠疫對於生命與主權威脅。鼠疫在短時間內被撲滅，除了代表清廷肯認、採用西方醫學技術外，背後實有主權與外交壓力的背景因素存在。面對這場鼠疫，清廷從中央到地方展現了應付鼠疫的能力，這讓我們有必要重新思考清末的政府職能，是否如革命黨所言，腐敗程度已到不堪聞問的地步？並且反思在革命史觀下，清廷必然覆滅的歷史解釋是否恰當。

關鍵詞：防疫、主權、肺鼠疫、錫良、伍連德、萬國鼠疫會議。

# Interaction Between Interior and Diplomacy: A Study Based on Manchuria Plague, 1910-1911

Chun-ying Wu<sup>\*</sup>

## Abstract

Interest in the study of Manchuria plague has revived in the past few years. Unlike previous studies which have focused mainly on anti-plague measure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present evidence that the epidemic control is not only nation's internal politics but also the diplomatic issues by the outbreak of 1910 plague in Manchuria. To control this serious epidemic was a real challenge to the administrative capacity of Ch'ing government. If the Ch'ing Dynasty failed to control an acute and widespread outbreak of epidemic, it may urge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Russia to expand their power competition for the benefit of Manchuria. The central government, Wai-wu-bu,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nd Hsi-liang, the governor of Manchuria, quickly had strong senses of the threat to life and sovereignty. From this viewpoint, one may say the reason why the Ch'ing Dynasty took western medicine to deal with the Manchurian plague was the diplomatic pressure and to eliminate the threat to national sovereignty.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the diplomatic pressure and sovereignty are tied closely with the successful control of the spreading epidemics. Local and central government made a concerted effort to show the capability of controlling the plague. It may give rise to rethink the past explanation – the corrupt Ch'ing Dynasty was destined to collapse –under the r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It remains as a matter to be reevaluated achievements of innovations of the Late Ch'ing Dynasty.

**Keywords :** infection control, sovereignty, pneumonic plague, Wu, Lien-te 伍連德, Hsi-liang 錫良, International Plague Conference of 1911.

---

<sup>\*</sup> Graduate student,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 從東三省鼠疫問題看清末的內政與外交 (1910-1911) \*

吳俊瑩\*\*

鼠威既肆不可遏。燎原一炬天山紅。輦轂風雲接三輔。

關塞蕭條斷行旅。居民避疫如避兵。朝廷防鼠如防虎。

〈鼠疫謠〉，《申報》1911年3月15日

## 一、前言

臺灣每年向WHO叩關的舉動，讓筆者興起追索近代中國參與世界性的衛生組織的源頭為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所庋藏的「外交檔案」保存相關的紀錄，但閱覽後則發現不少只是形式上的參與，除開外交檔案事務性與例行性簡要敘述外，難以再找到相關史料深入探究。就在翻閱《東方雜誌》時，竟然發現清廷覆亡終結前，舉辦了「萬國鼠疫會議」（International Plague Conference），會議舉辦的時間點是「腐敗」的滿清政府在四個月內，撲滅20世紀初最大的一場鼠疫後於奉天召開。這場鼠疫的罹疫死亡人數近6萬人，財產損失更是難以計算。<sup>1</sup>就清末以來中西醫勢力消長而言，研究指出：清廷已認識到傳統中醫難以處理這波

---

\* 本文承蒙兩位匿名審查人與唐啓華教授提供寶貴意見，特此致謝。

收稿日期：2009年1月19日；通過刊登日期：2009年4月14日。

\*\*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生

1 據晚清奉天防疫局編纂《東三省疫事報告書》中統計，東三省罹疫死亡人數為50,927人，但若包括關內河北、山東、北京、天津等地，死亡人數則達6萬餘人。杜山佳，〈萬國防疫會記〉，《東方雜誌》，第8卷第3號（1911年4月），頁15-28。焦潤明，〈1910-1911年的東三省大鼠疫及朝野應對措施〉，《近代史研究》，總第153期（2006年3月），頁109。

來勢洶洶的疫情，首次將疫情撲滅工作，交給受過西方醫學訓練的專門人員，放棄他們對於傳統醫學的堅持信念。<sup>2</sup> 甚至有論者認為這次大鼠疫是「西方醫學在中國興起的重要因素」，公共衛生的防疫基礎在疫後初步建立，清廷也把西方醫學視為中國未來現代化的必要部分。<sup>3</sup> 清政府應付這場鼠疫背後交織著多重意義。

2003年SARS造成全球性恐慌、人心惶惑不安之際，當醫學界對防疫戮力以赴的同時，科學史界開始注意到近代中國如何處理傳染病的問題。<sup>4</sup> 有趣的是，竟然有人找上了在臺灣並無太多人認識的伍連德博士（1879-1960），1910年伍連德在東三省對抗這場鼠疫的事蹟與作法，也被拿來與處理SARS的隔離措施相對照。「鼠疫（1910）/ SARS（2003）」竟然微妙地勾連起來，沉睡在歷史中的伍連德則在SARS風暴被人憶起。<sup>5</sup>

研究回顧上，目前臺灣學界尚未展開相關研究，但不少名人傳記類文章，則以伍連德生平作為探討對象，這或許與伍連德曾出版自傳，提供了不少撰寫素材有關，相對地忽略參酌伍連德自傳以外的相關材料。<sup>6</sup> 中國學界亦有不少研究同樣將重心放在伍連德事蹟上，<sup>7</sup> 不過近來已有學者

---

2 Wang, Chi-min (王吉民), Wu, Lien-te (伍連德),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ng a Chronicle of Medical Happenings in China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Period* (Tientsin, China: Tientsin Press., 1932), p. 431.

3 John Z. Bowers, *Western Medicine in a Chinese Palace* (Philadelphia: Josial Macy Jr. Foundation, 1972), p. 25. 轉引自費克光 (Carney T. Fisher) 著、林玉梅、劉翠溶譯，〈中國歷史上的鼠疫〉，收錄於劉翠溶、伊懋可主編，〈積漸所至：中國環境史論文集（下）〉（臺北：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1995年），頁728。費克光於此文也初步處理了這場鼠疫的起因、擴大與處理方式。

4 當然與臺灣一般人民最為直接的歷史記憶與經驗，應當是日治時期殖民政府在撲滅鼠疫上的種種措施，關於這方面的研究可參見范燕秋，〈疫病、醫學與殖民地現代性：日治臺灣醫學史〉（臺北：稻鄉出版社，2005年）。該書中除針對殖民政府的各項鼠疫研究與防治措施外，也透過私文書如日記資料，探討時人對於鼠疫的反應與心理狀態，以及政策執行上的各種面向。

5 〈進行式科學以讀攻毒知識跨時空〉，《民生報》，2003年5月30日，版3。〈鼠疫專家中國史書未重視〉，《聯合報》，2003年5月29日，版B6。王道還，〈防疫的故事〉，《聯合報》，2003年4月29日，版E7。

6 鍾金湯、劉仲康，〈黑死病鬥士—伍連德醫師（上）、（下）〉，《科學月刊》，第282、283期（2001年10、11月），頁878-886、976-983。吳相湘，〈伍連德是中國近代醫學的先驅〉，《傳記文學》，第45卷第2期（1894年8月），頁40-54。

7 張偉男，〈東三省防疫處舊址與防疫泰斗伍連德博士〉，《北方文物》，總第64期（2004年4月），頁87-88。

注意到清末瘟疫與民衆心態的轉變及其防疫應對措施，<sup>8</sup> 以及伍連德防疫思想探究。<sup>9</sup> 亦有研究者從現代性經濟擴張觀點，由鐵路系統的建立、運輸量的具體變化，試圖解釋1910年這場鼠疫何以跨區流行，造成空前死亡人數。<sup>10</sup>

與本文視角類似，從政治外交層面切入此一問題者，當為安貴臣、杜才平撰寫〈1911年國際防疫會議背景分析〉一文，該文側重鼠疫爆發後美日俄三國如何在東三省獲取更多利益，以及中國防止東三省主權進一步淪喪的外交鬥爭，作者指出美國之所以協助清廷，則是延續其門戶開放政策，乃是維持自身利益的具體實踐。<sup>11</sup> 此文另闢蹊徑，提供了觀察此次東三省鼠疫的另一視角，但由於過分側重外交與實質利益上的剖析，較缺乏清廷本身對於鼠疫的相應措施與外交的相互關連性，並太過強調日俄侵略一面，沒有考慮到鼠疫傳染不分國界，其間亦有協力防堵之一面。安、杜二人的論文中，不少論證觀點與史料來源，來自美國學者Carl F. Nathan的*Plague Prevention and Politics in Manchuria 1910-1931*（中文題為《東三省防疫與政治》）一書，該書利用美國駐東三省的領事報告以及皮藏於國家檔案館中的剪報為主要材料撰成，著重於現代化公共衛生與主權之間的互動關係，由於清廷能夠體認現代化公共衛生與主權捍衛之間的連動關係，藉由公共衛生的整備，阻止日俄藉口對東三省採取進一步的行動，因此東三省的防疫體系的建立，不只具有醫學上的意義，同時肩負著政治使命。<sup>12</sup> 該書史料充分詳實，提供筆者不少參考史料，並得進一步思索清廷

8 胡勇，〈清末瘟疫與民衆心態〉，《史學月刊》，2003年10期（2003年10月），頁73-78。焦潤明，〈1910-1911年的東三省大鼠疫及朝野應對措施〉，頁106-124。後文雖是新近研究，只是靜態地透過報紙資料來論述官民如何面對這場鼠疫，由於未能掌握日本學者飯島涉的研究成果，甚至連防疫要角伍連德的自傳也未見引用。因此本研究主題雖與先前研究已有一定重複，但切入角度不同，論及這場鼠疫何以如此迅速被撲滅時，除了焦潤明所言「防則生不防則死」的壓力外，並未考慮到「外部」壓力如何促使清朝官民採取更為積極的應對措施，也未能理出此前所未見的防疫措施在歷史脈絡中的意義。

9 林宇梅，〈伍連德科學防疫思想及其實踐〉，《民國檔案》，2004年4期（2004年11月），頁121-123。

10 胡成，〈現代性經濟擴張與烈性傳染病的跨區流行—上海、東三省爆發的鼠疫、霍亂為中心的觀察（1922-1932）〉，《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1期（2006年3月），頁91-129。

11 安貴臣、杜才平，〈1911年國際防疫會議背景分析〉，《臺州師範學報》，第22卷第4期（2000年8月），頁35-39。

12 Carl F. Nathan, *Plague Prevention and Politics in Manchuria 1910-1931* (Cambridge: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distribut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防疫措施的思考出發點。惟該書獨賴美方資料，是為缺憾之一，若能對照中國方面的資料，對事件的還原與拼湊將更為全面。日本學者飯島涉透過鼠疫傳染病，試圖論證19世紀末葉20世紀初期中國衛生事業的開展與國家建設相互關係的同時，對1910年這次鼠疫著力甚深，探討日本如何藉由衛生行政手段介入中國社會，並討論到了衛生問題的「政治性」連帶引發與主權方面的糾葛，<sup>13</sup> 此點給予筆者相當啟發，同時也提供不少日方一手材料。惟筆者希望能嘗試從清廷的立場與觀點來立論，並與飯島涉的研究相互對照。

史料運用方面，本文將利用報紙資料，特別擷取東三省當地由日資贊助的《盛京時報》，以及具有悠久發行歷史的《申報》相互參照，兼顧不同立場；檔案部分則利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外交部門檔案》、日本國立公文書館亞細亞資料中心檔案、相關人物的回憶錄、奏摺等史料。本文前半部將先瞭解這場鼠疫的來龍去脈，探討鼠疫對時人心理層面的衝擊；後半部為本文論述主軸，將側重原屬內政的防疫工作與外交環境壓力之間的互動，特別是中國所持的立場與底線為何？外務部在此次鼠疫問題交涉上扮演的角色與立場為何？最後歸結內政與外交的互動關係，並試圖詮釋其所代表的意涵。同時也兼論關內對於鼠疫的反應與相應措施，反思此次防疫工作與清末庚子新政的附帶意義。

## 二、清季的衛生環境與國際關係

衛生與外交表面上看似無關，但清末隨著西方人在華勢力的擴張，兩者連動性益增。以上海為例，當西方列強以租界為據點，1880年代引進西方近代細菌學理論時，華人諸多的「不衛生」現象，包括身體的「不潔」與環境的「污穢」，被嵌入預防醫學與公共衛生的結構之內，衛生由個人提升到公共層次，並被連結成為傳染病的爆發與蔓延因素。<sup>14</sup> 西方人

13 飯島涉，《ペストと近代中国—衛生の「制度化」と社会変容—》（東京：研文出版，2000年），頁127-208。

14 胡成，〈「不衛生」的華人形象：中外間不同講述—以上海公共衛生為中心的觀察（1860-1911）〉，



即以衛生的公共性為由，要求清廷必須依西方的標準來處理衛生問題，若不願積極處理或未符西方標準，外人起而干涉衛生內政即有其合理性。這種衛生與外交之關係，逐漸為中央與地方菁英所意識，作為清末知識菁英吸收世界知識與國際情況的《外交報》，曾選譯日本外電報導，充分反映前述西方列強的普遍思維：

中國都會地方人口漸稠，而溝渠不通，道塗不治，飲水不潔，以致炮瘡霍亂等症，時至蔓延。故文明諸國，為公眾衛生計，當引中國為一可畏之敵，……今日計宜由外人強迫華官，毅然行清道之政，否則要求中國，舉各口岸之衛生要政，希由外人任之，若然或稍能去茲害爾。中國衛生之事，亦當以交涉論，即令文明諸國起而干涉，故不得目為不法也。<sup>15</sup>

《外交報》之所以選譯此則外電報導，透露出中國公共衛生的良窳，將會成為外交或主權上的交涉問題，西方列強以中國衛生條件差，未能有效改善環境衛生的情況下，基於公眾衛生起見，外國干涉即屬合理，而且是符合「文明」的舉措。1899年英國駐上海總領事致函北京公使團，提出擴展租界的要求，理由即在於毗鄰的華界污穢，疾病經常隨之傳入租界之內，上海華人菁英開始注意並呼籲民眾與官府注意衛生的議論，藉此防堵外人藉口華界衛生與防疫不力，作為擴張租界之由。<sup>16</sup> 不僅地方官民菁英已然意識到防疫涉及國家主權與政府形象，<sup>17</sup> 上海甚至出現實際行動自上海工部局取回華人自主檢疫之權。<sup>18</sup> 不惟地方，清廷中央外務部更不時要直接面對類似問題。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6期（2007年6月），頁13。

15 〈論中國不講衛生之害〉（譯自日本九月份太陽報），《外交報彙編》，第3冊（臺北：廣文書局，1964年），頁403-404。

16 胡成，〈「不衛生」的華人形象：中外間不同講述—以上海公共衛生為中心的觀察（1860-1911）〉，頁31-33。

17 湖南總督瑞澂就將「檢疫」視為「國權」的一環，不宜輕開外人干涉之風。〈湖廣總督瑞澂奏預防染疫設所查驗摺〉，《政治官報》，第1201號（1911年3月7日），頁10-11。

18 胡成，〈檢疫、種族與租界政治—1910年上海鼠疫病例發現後的華洋衝突〉，《近代史研究》，第160期（2007年7月），頁74-90。

1910年大規模鼠疫爆發前，已出現外國使節照會外務部有關傳染病的處理問題。1909年西班牙駐華公使賈司理照會外務部，聲稱各國駐京大臣驚聞唐山瘟疫流行，尤恐傳至北京、天津，各國使節深切願意協同中國處理瘟疫，並表示：「本大臣深知中華，無此等醫，若有，則能阻除瘟疫，不使傳染，欲延此等醫生，日本與香港皆有。英、日欽差大臣均允本大臣請照貴親王，兩國醫生即可請該國諭旨，立刻來京；或用法國醫生美呢，此人在天津，貴部久聞該醫等皆能截阻傳染」。<sup>19</sup> 外務部接獲照會後隨即去電北洋大臣詳查情形，北洋大臣楊士驤（1860-1909）電稱，唐山等地疫症已於去年冬天「業已淨盡，現在頗稱靜謐」，目前對於瘟疫的防治未曾稍緩，而「中西醫員均於此症極精，足可敷用，且北洋防疫有年，皆係熟手，似無庸另行延醫幫同」。外務部便以此照覆賈司理。<sup>20</sup>

外務部另電楊士驤，要求對瘟疫傳染謠言多加防範，並述及「各使屢次來照提及，自應格外防微，以杜幹預」，同時應將防範辦理情形廣登西報，以釋外人之疑慮。<sup>21</sup> 楊士驤回覆外務部表示，已責成各有關當局認真防範，並以法醫梅尼的報告說明該地至今並無發現新疫情，但因瘟疫「事關公共治安防範，不厭精詳，飭令梅尼等加意查驗，毋使滋患」。<sup>22</sup> 外務部則照錄楊士驤的來函照覆西班牙公使，並特別強調已由「法醫」梅尼確認該地未見疫症流行。

由此次外務部與西班牙公使往來照會來看，外務部對於可能波及北京、天津使館區的疫症十分重視，特別要求北洋大臣嚴加處置「以杜幹

19 〈西班牙駐華公使賈司理為唐山瘟疫流行薦醫截阻傳染事致外務部照會〉（1909年2月6日），收錄於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北京大學、澳門理工學院編，《清代外務部中外關係檔案史料叢編—中西關係卷第三集》（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頁1100-1104。

20 〈外務部為唐山瘟疫業已淨希轉達西班牙公使賈司理照會稿〉（1909年2月13日），收錄於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北京大學、澳門理工學院編，《清代外務部中外關係檔案史料叢編—中西關係卷第三集》，頁1116-1121。

21 〈外務部為唐山瘟疫謠言頗眾廣派員加意防範並廣登報紙釋疑事致北洋大臣信函〉（1909年2月13日），收錄於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北京大學、澳門理工學院編，《清代外務部中外關係檔案史料叢編—中西關係卷第三集》，頁1122-1123。

22 〈北洋大臣楊士驤為唐山現無疫情無庸另聘西醫事致外務部函〉（1909年2月18日），收錄於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北京大學、澳門理工學院編，《清代外務部中外關係檔案史料叢編—中西關係卷第三集》，頁1124-1126。



預」，外務部知道瘟疫等傳染疾病一旦處理不慎，極有可能招致外國干預。此次外務部反應迅速，立刻責由北洋大臣儘速回報處理，掌握全盤狀況外，為釋賈司理之疑，也藉法醫之口說明疫情，藉以取得賈司理的信賴，處理明快，不致衍生後續問題。

### 三、鼠疫爆發與中外反應

西班牙公使賈司理對於鼠疫的擔憂並非無中生有，甚不幸言中。1910年（宣統2年）10月疫情始見於中俄交界之滿洲里，<sup>23</sup> 12月哈爾濱亦見疫情。1911年1月首見於奉天，隨後疫情勢如燎原般，迅速往南傳播，奉天以南陸續爆發鼠疫，不及一月，疫情由關外向關內蔓延，京畿首府也無法倖免於難。<sup>24</sup> 此次鼠疫不僅發生於滿洲龍興之地，並蔓延至關內，京畿內上至皇帝下至小民生命安全堪慮外，向來對中國防疫不具信心的各國駐華使節無不驚恐萬分。因此清廷是否有足夠的能力處理此一疫情，如何避免各國藉防疫問題，從而侵害主權，這對大清帝國來說，不啻是一場嚴峻考驗。

盤據在東三省的日俄勢力藉機擴張的威脅性，由東三省總督錫良（1853-1917）奏稿中表露無遺：

自日俄戰爭以來，久成南北分裂之局。日人以旅順大連為海軍根據地，其鐵道直貫東省南部，俄人以海森崙為海軍根據地，其鐵路橫貫東省北部。兩國陸軍均不數日可達，東省命脈蓋已懸於兩國之手，無可諱言。<sup>25</sup>

可以想見，虎視眈眈的日俄兩國，極有可能以防疫為由，將擴張舉動合理化，若清廷無法提出有效的衛生防疫措施以為反制，那麼日俄極有

23 〈哈爾濱·肺卑斯杜疫猖獗彙誌〉，《盛京時報》。1910年11月8日，版5。《盛京時報》採舊曆紀年，為行文時序清楚，皆已換算為西元紀年。

24 〈萬國防疫會議伍會長說詞〉，《申報》，1911年4月12日，第2張後幅版2。

25 轉引自王芸生編著，《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五卷）》（北京：三聯書店，1980年），頁243。

可能以中國防疫不力為由，趁機擴張在東三省的影響力。其中日本又得以鐵道附屬地與既有的衛生行政建置，做為干涉中國防疫工作的基礎。

1905年日俄戰爭後，日本由俄國手中取得旅順、大連兩港灣租借權，長春至旅順口之鐵路隨之移讓日本，日本勢力正式插足東三省。<sup>26</sup> 日本並在先前俄國中東鐵路兩側數十公里的附屬地基礎上，<sup>27</sup> 以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為名，展開對東三省的經營，並在南部鐵路沿線建立類似租界與殖民地性質的滿鐵附屬地。1907年滿鐵選定瓦房店、蓋平、熊岳、大石、海城、奉天、鐵嶺、長春和關東州所在地的大連開始進行市街規劃政策，營造適合日人生活的空間與設施，其中軍警設施在附屬地中占有突出位置，從根本上排除中國的行政權，<sup>28</sup> 面積約183平方公里，<sup>29</sup> 日本強力行使附屬地行政權的態度遠較過去俄國為甚。<sup>30</sup> 加上滿鐵附屬地隨鐵路沿線分布於東三省南部主要城市中，鼠疫爆發更讓日本得藉口防疫，以附屬地為起點，侵奪清廷衛生行政權。

日本自1898年由俄國取得旅大租借地以來，早已注意到衛生事業的重要性，以日本患者為服務對象的滿鐵大連醫院於1907年開始運作；對於中國人的醫療則仿效殖民地臺灣的「公醫制度」，派遣公醫至偏遠地區

26 王芸生編著，《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四卷）》（北京：三聯書店，1980年），頁201-202。

27 附屬地起源於1896年清政府派李鴻章赴俄祝賀沙皇加冕典禮，與俄國簽訂了《中俄禦敵相互援助條約》（簡稱《中俄密約》），在條約中規定了建設中東鐵路事宜，鐵路的興築當時形式上是清政府與俄亞銀行，即國家與私人之契約為之；從實質上而言，此契約與中俄兩國間的條約有同等效力。鐵路興建時，附屬地作用在於畫出一定區域供防護鐵路安全的軍隊駐屯、鐵道及相關事業從業人員居住、貨物集散、招攬商人與旅館設施等之用。附屬地內的警察權、土地使用權與行政權等均由中國政府賦予中東鐵路公司。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十年史》（大連：滿洲日日新聞社，1919年），頁693-694。「論中東鐵路附屬地問題（譯自三月分東京《外交時報》）」（1924年4月），《外交部門檔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檔號：03-46-029-24-002。

28 區曉范，〈滿鐵附屬地與近代東三省城市空間及社會結構的演變〉，《社會科學戰線》，2003年1期（2003年1月），頁155-156。

29 1907年經過實測、清理、購買等方式處理後，同年底附屬地面積達55,285,944坪，約合182.76平方公里。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十年史》，頁735。

30 劉彥，《最近三十年中國外交史》（臺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民國19年版，1986年），頁62-67。日本單方面宣稱在滿鐵附屬地內排除清國高權行政，附屬地內裁判、外交事務由日本領事掌管；軍事與警察權屬關東都督；其他一般行政權則由滿鐵總裁行使。但關於附屬地的法理在當時仍有爭議，但實際上附屬地內駐有日警，主權國家的行政權力幾乎操於日人之手，即便到1920年，北京政府官員仍指出「中東、南滿兩路經過之處，各有其鐵路用地，其性質與租界幾無以異……南滿路用地界內，各站無不駐有日警，我國政權向難施行該處……」。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十年史》，頁691-693。「奉省滿鐵附屬地華商貼用印花事咨覆查照由」（1920年1月8日），《外交部門檔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檔號：03-19-022-01-002。

服務，衛生體系則結合保甲制度建立通報系統，防堵傳染病擴散；對做為衛生行政基礎的港灣檢疫工作，則與海關總稅務司赫德（Robert Hart, 1835-1911）相商，取得大連海關的人事影響力，於1907年展開海港檢疫工作。<sup>31</sup> 日本這套已見雛形的防疫體系，成為介入清廷防疫工作的基礎條件。

日俄之外，美國在東三省的棉紡出口市場利益極為龐大，美國也擔心日俄兩國藉鼠疫爆發，擴張勢力範圍。1905年美國方面先是提議收買南滿鐵路的「哈里曼計畫」（Harriman's Plan），<sup>32</sup> 繼於1909年美國務卿諾克斯（Philander Chase Knox, 1853-1921）提出滿鐵中立案，<sup>33</sup> 反而促使日俄密切聯合以拒美國，計畫因而告終。因此東三省鼠疫爆發，對美國而言不只是醫學防疫考量，十分擔憂日俄藉機掠奪中國，損其利益。<sup>34</sup> 美官員更曾面告外務部右丞施肇基（1876-1958），極力要求清廷提出更積極有效的措施，以免日俄藉口避免疫情蔓延至西伯利亞、朝鮮為由，以保護勢力範圍利益，啓二國趁機干預之機。<sup>35</sup> 外交戰略上，美國與清廷表面上利害一致，不但回絕與日俄聯合調查疫情之請，在外交策略運用上顯然企圖維持清廷在東三省的行政權獨立，以維護其向來主張的門戶開放政策。

當然美國對於清廷的協助亦不敢大張旗鼓。美駐北京的外交官員表

31 飯島涉，《ベストと近代中国—衛生の「制度化」と社会変容—》，頁176-183。

32 日俄戰爭結束後不久，美國太平洋鐵路公司大亨哈里曼（Edward Henry Harriman, 1848-1909）曾著手計畫建立一個全球運輸系統，企圖由日本取得南滿鐵路控制權，並向俄國購買中東路權，從而取得穿越西伯利亞以達波羅的海的鐵路使用權，再開闢一條到美國輪船航線，接貫美國鐵路，並由太平洋郵船公司完成橫渡日本的輪船聯運，不僅可滿足美國在東亞的商務需要，美國在東方支配地位也可確立。這個構想在美國駐日公使葛里斯康（Lloyd C. Griscom）的運作下於1905年10月12日與首相桂太郎達成日美組成合股公司，收買南滿鐵路及其附屬財產，日後鐵路改築、修復、延長與財產均歸雙方所有的備忘錄。三天後卻遭到甫自樸資茅斯和談會議歸國的外相小村壽太郎激烈反對，認為這是日本人用財產和鮮血換來的財產與市場，為何要與美國共享？備忘錄遂為日方擱置。陶文釗，〈日美在中國東北的爭奪〉，《世界歷史》，1996年第1期（1996年2月），頁14-15。

33 諾克斯透過美駐日大使歐布萊恩（Thomas J. O'Brien），醞釀由日、美、英、德、法、俄六國，共同向清政府提供貸款，贖回日本和俄國所有的鐵路，把東三省鐵路作為商業目的，由六國共同經營，不為軍事或政治目的使用。但英國政府在已有的英日同盟默契下，不願冒犯日本，日、俄同時照會美國大使聲言拒絕，此一計畫遂告終。陶文釗，〈日美在中國東北的爭奪〉，頁17-18。

34 安貴臣、杜才平，〈1911年國際防疫會議背景分析〉，頁35-36。

35 Carl F. Nathan, *Plague Prevention and Politics in Manchuria 1910-1931*, pp. 6-7.

示，一旦美國毫不掩飾介入東三省，日俄以其目前在滿洲的經營現狀與勢力，更有立場宣稱為保護既有利益率先介入；一旦外力介入中國，意謂清廷束手無策，進而給予日俄採取更進一步行動的理由。<sup>36</sup> 因此，清廷勢必得有能耐妥為因應，況且來自美國的實質支持不可能太多。

身處關內的清廷與關外督撫，起初對於北滿一帶爆發的疫情並不積極處理，而是日、俄鐵路公司先行著手處置此次致死率極高的肺鼠疫。<sup>37</sup> 相較之下，中國方面反應相對遲緩，關外輿論指出：「夫今日從事於防疫者，殆全為外人，我國官吏，則猶晏如也」，大聲呼籲官方迅速以對。<sup>38</sup> 直至鼠疫傳至奉天後，「京師中外人士大為恐慌」，<sup>39</sup> 清廷才一改消極態度，對於東三省的防疫經費，在財政困難下仍大力支援，不僅動支皇室內帑，<sup>40</sup> 中央度支部另飭大清、交通銀行借銀30萬兩供錫良調度，<sup>41</sup> 並另由大連稅關撥銀15萬兩充實防疫經費。<sup>42</sup>

北京東交民巷內，各國使館因風聞鼠疫即將傳播至京，人心惶惑，西報輿論咸對清廷防疫能力毫無信心，皆言「各城均已傳染，似無收拾之望」。<sup>43</sup> 於是使館區決議採取自保之道，不日「將與使館界外之人停絕交通」，<sup>44</sup> 禁止華人入使館界內。外人對於鼠疫之惶恐與義和團變亂時不相上下，《申報》甚至以「拳匪竟不如鼠」諷刺報導外人驚恐之狀，言道：「從前拳匪猖獗時，環攻使館，砲彈、槍子落於使館屋上者如雨，我西人猶談笑自若，絕不驚惶」，但此次面對鼠疫威脅，不但禁絕東交民巷之交

36 Carl F. Nathan, *Plague Prevention and Politics in Manchuria 1910-1931*, pp. 34-38.

37 1894年醫學界確認鼠疫是以老鼠身上的跳蚤為媒介傳播鼠疫桿菌，學名為葉赫森鼠疫種（*Yersinia pestis*）。鼠疫又可分為肺鼠疫（pneumonic plague）與腺鼠疫（bubonic Plague）。肺鼠疫有傳染力尤高，是人與人之間近距離的飛沫傳染，並非透過老鼠身上的跳蚤傳染，此次滿州鼠疫即為肺鼠疫，是致命性極高的急性傳染病，未經治療的肺鼠疫可能在1-6日內死亡，死亡率高達95%。Wikipedia contributors,〈腺鼠疫〉，收錄於「Wikipedia 自由的百科全書」：<http://zh.wikipedia.org/w/index>（2009/4/18 點閱）

38 〈論說：防疫談〉，《盛京時報》，1910年11月18日。

39 「滿州鼠疫記」，《申報》，1911年1月21日，第1張後幅版2。

40 〈北京防疫記〉，《申報》，1911年2月3日，第1張版5。

41 〈度支部奏議覆東督奏疫重借款請歸入江皖振捐案內展辦清償摺〉，《政治官報》，第1199號（1911年3月5日），頁10-12

42 〈緊要新聞：鼠疫由北而南之大警告〉，《申報》，1911年1月22日，第1張後幅版2。

43 〈西報紀滿州疫症之危象〉，《申報》，1911年1月20日，第1張後幅版2。

44 〈西報記北方患疫近狀〉，《申報》，1911年1月21日，第1張後幅版2。

通，甚有使館預借三個月存糧，「莫不憂形於色，急急設防」。《申報》記者略帶諷刺揶揄口吻說：「夫以如狼如虎之拳匪，曾不若腐鼠之一嚇，亦可異矣！」<sup>45</sup>《申報》記者觀察到鼠疫威脅，認為遠勝拳匪之禍，顯露西方人心理極度不安心態。

驚慌之餘，為求自保，外交團頻頻向清廷施壓。外交團曾擬請民政部暫時禁止京城內戲園演戲若干日，待疫情消滅後再行開演，並聲明若中國官員徇於情面，置人命於不顧的話，「外交團將藉詞防疫，代中國官吏操衛生行政權」。<sup>46</sup>此外，各國公使聯袂赴外務部，以山海關防疫不力為由，擬由各國分派兵隊前往固守，對不服攔阻、強行入關之人予以射殺。外務部認為茲事體大，恐生事端，據理爭辯後，商定由陸軍部派兵前往守禦。外務部另曾接獲外交團照會，要求給予自東三省入關外人，免除五日滯留觀察期，予以通融辦理，以利來往交通，對此外務部官員回覆表示：「鼠疫傳染不分中外，若外國人可以通融辦理，難保疫氣不輾轉發生，且各國通例，凡疫症發生之處，所有往來孔道，不論何國人士，均須一律照章檢查，從無對外人可以通融之理，……不能獨寬外人。……按之萬國防疫通例，礙難照辦」。<sup>47</sup>

防疫一事首尾萬端，外人藉機干預的壓力不斷，清廷內外交逼，宛如「將沉之舟」，對於外交團頻頻提出的各項要求，外務部若要能固守立場，加以回駁，勢必得讓外人取信清廷的衛生行政的能力，否則「外人起而干涉」的壓力將因鼠疫爆發有增無減。<sup>48</sup>

#### 四、清廷防疫措施與日、俄的態度

19世紀後伴隨著歐美帝國主義的到來，加上接二連三喪失朝貢國，以及與英美等列強交涉「藩部」問題的過程中，清廷逐漸感受到「版圖」

45 〈時評：拳匪竟不如鼠〉，《申報》，1911年2月6日，第1張版6。

46 〈北京防疫記〉，《申報》，1911年2月3日，第1張版4。

47 〈北京防疫記〉，《申報》，1911年2月3日，第1張版4、5。

48 〈論吾國今歲前途之希望〉，《申報》，1911年2月10日，第1張版2。



的意義，接納了西方的「主權」概念，<sup>49</sup> 不再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前近代式帝國概念。在與西方往來進入條約體系後，主權觀念漸萌，畫出了一個政治實體的疆界，不容侵犯。此際疫情蔓延關內外，關內不僅紫禁城內皇族生命堪慮，各國使節也在驚慌失措之餘，極力施壓；關外則有日俄勢力虎視眈眈。列強藉機擴張之舉，勢必與主權問題有所衝突。因此，清廷眼前問題將是如何迅速撲滅疫症，方能有效固守行政主權。

### （一）京畿防疫措施

疫情傳入關內後，民政部才積極展開各項防疫工作，盼能亡羊補牢，為時不晚。1911年1月27日，民政部建議仿照日本因應大阪鼠疫流行，於該地特設臨時預防鼠疫事務局之例，成立「京師防疫局」，分科專司檢菌、捕鼠、診斷、檢驗、清潔、消毒、注射等事，<sup>50</sup> 設總分局4所，並在永定門外加設防疫病室隔離室，若有疫症傳出，隨即結合該管警區會同醫官檢視，將該處消毒封閉，切斷交通，即便是尋常病故者亦得由醫官檢視後，方准殯殮。環境衛生方面，內外城旅店、飯館、茶樓與市場等處，均令醫官逐日檢查，特設衛生警察，督飭清道夫役加強各街巷灑掃，隨時稽查對妨害公共衛生或不遵守清潔規章者將按違警律科罰。京畿一帶，則會同郵傳部檢驗來往火車旅客，徒步來京者特別是查驗留置重點人員。民政部指出：此次防疫所有辦法，「均為我國人民素未經見之事」。防疫局每日辦事成果除列表報部查核，一面送交《政治官報》刊載外，「並將表冊送由外務部轉致各國公使，以安外賓」。<sup>51</sup>

鼠疫爆發當時，適值農曆年前後，大批返鄉人口向關內移入，升高關內疫情的緊張情勢。但清廷對於旅客與貨物的留置查驗，極為嚴格，有效截阻疫情入關。對於關內華洋雜處如天津租界地，則由醫官隨時查察，巡警隨時報告，若發現病例則立刻隔離消毒，據直隸總督陳夔龍（1857-

49 平野聰，〈「『公正な帝国』から『近代中華帝国』へ—清帝国の統治構造変動と民族問題—」〉，收入歴史学研究会編，《帝国への新たな視座》（東京：青木書店，2005年），頁308-313。

50 〈奏摺類·民政部奏酌擬京師防疫局章程摺〉，《政治官報》，第1148號（1911年2月18日），頁3-5。

51 〈民政部奏臚陳辦理防疫情形摺〉，《政治官報》，第1204號（1911年3月10日），頁8。



1948）稱：「城廂租界，患疫華民，概由衛生局辦理，外人均尚信服，民情亦即相安」。<sup>52</sup> 此次諸多防疫辦法，實為創舉，雖人民「不敢顯違禁令，究不免目為多事，疑謗橫生」。但會有「目為多事」的抱怨，意謂清廷諸多舉措不只是紙上空談，而是對防疫工作抱持戒慎恐懼的態度。

## （二）東三省防疫措施

東三省防疫由於日俄勢力盤據，防疫與主權兩者之間的糾葛更為明顯。以下將分別討論清廷與日、俄三方面所展開的防疫措施，並將重點放在防疫與主權的相互糾葛上，探討東三省總督與外務部如何面對此一難題。

由於鼠疫疫情隨鐵路南下，形成大範圍的跨區域流行，<sup>53</sup> 事態擴大，東三省總督錫良不得不採取更積極的態度來面對。在消極方面，主要是落實「截阻交通」與「設局檢疫」二項工作。採取措施包括派兵扼守各交通要地防堵徒步旅人南下，同時在山海關與奉天等鐵路要害之處創設臨時病院，收容疑似患者與確定病例，並於各車站設置醫員進行檢疫，留置旅客5至7日，如無病症，始予放行。為求防疫事權統一，聯絡吉林、黑龍江兩省共同防疫，1911年1月14日，設「奉天防疫總局」，附屬於奉天行政公署，由民政司、交涉司聯合辦公，隨後省內各廳設置臨時防疫機構達630餘處，參與防疫的醫務、警察人員達3,000餘人。<sup>54</sup>

以奉天一地為例，該地衛生醫院、巡警總局會同由民政、交涉兩司聯合組織「奉天臨時防疫所」，明訂捕殺、收買鼠隻、戶口檢查、疑似病例報告、死體檢驗法、病毒污穢物搬運限制法、集會限制、旅客檢驗、一

52 〈直隸總督陳夔龍奏辦防疫情形摺〉，《政治官報》，第1198號（1911年3月4日），頁12-15。

53 東三省在19世紀以前還被視為是盛產人蔘、煙草和馬賊的關外之地，但20世紀以來，隨日本、俄國勢力進入，帶來現代性經濟擴張現象，其中又以中東鐵路、南滿鐵路的開通，使得大連、奉天、長春、哈爾濱等位於鐵路節點上的城市迅速發展，並聚集了來自山東、山西、河北、河南等地的流動性人口。不僅城市快速都市化，鐵路沿線上的中小城鎮連帶崛起，這使得原本的生態間隔被打破，空間距離縮短，疫情可隨著交通線路跨越地理空間限制，快速蔓延。胡成，〈現代性經濟擴張與烈性傳染病的跨區域流行—上海、東三省爆發的鼠疫、霍亂為中心的觀察（1902-1932）〉，頁96、99、102-103。

54 焦潤明，〈1910-1911年的東三省大鼠疫及朝野應對措施〉，頁110-111。

般衛生上注意等防疫辦法。<sup>55</sup> 從內容觀之，防疫作法符合當時世界先進各國處理水準，若能詳細徹底執行，將能有效杜絕鼠疫蔓延。尤其「隔離」事關防疫成敗，為「攻堅之中樞」，若要收效，不外乎「嚴厲」與「迅速」二點，輿論更是要求政府應當以強制力保全大局，<sup>56</sup> 吉林與黑龍江兩省隨後亦建立以隔離為重心的防疫機制。<sup>57</sup>

外務部對於防疫與主權一事，始終縈繞於心。外務部在施肇基的推薦下，派劍橋醫學博士伍連德任哈爾濱全權總醫官，率領天津軍醫學堂赴鼠疫最嚴重的吉林省處理鼠疫，並進行傳染病學調查研究。伍連德與錫良密切合作，採取控制交通、隔離疫區等措施，完全按照西方科學標準辦事。<sup>58</sup> 由於防疫工作特重檢疫，故檢驗工作量龐大，醫生不敷使用，外務部不得不藉外國醫生之力。不論起用伍連德或是聘請西醫，外務部無非都在建立一套符合西方標準的鼠疫防治體系，宣示清廷有能力處理此一疫症，讓日俄兩強沒有藉口干預中國防疫主權。

但防疫本身極具危險性，致使數名外務部特派醫生染疫身亡，包括法國梅尼（Mesny）、英國嘉克遜（Jackson）與日本醫生守川等，皆為協助清廷防疫命喪黃泉。據《申報》載：英醫嘉克遜「朝夕在京奉車站辦事，凡苦力在各店疫病者，雖極穢褻之地，亦必躬自往診。……君年甫二十七，氣體壯盛，乃為吾國查疫而死，真能實行耶教捨身救世之意」。<sup>59</sup> 在防疫如禦敵的情形下，若不多加獎勵則不足以鼓舞士氣，因此外務部以每月俸銀350兩，另給來往旅費，染疫罹難者則給1萬兩撫卹金，以此條件招聘教會「義勇醫士」赴東三省除疫。<sup>60</sup> 尤其在撫卹方面，外務部堅持地方官員不可調降撫卹金額，以免打擊防疫人員士氣，故曾致

55 〈奉天：奉天臨時防疫所辦事規則〉，《盛京時報》，1911年1月10日，版5。

56 〈論說：論防疫必宜隔離〉，《盛京時報》，1911年1月17日。

57 焦潤明，〈1910-1911年的東三省大鼠疫及朝野應對措施〉，頁110-112。

58 奴元翼，〈防疫工作的先驅者—伍連德博士〉，收錄於哈爾濱市委員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哈爾濱文史資料（第三輯）》（黑龍江：出版者不詳，1984年），頁151-154。

59 〈東省防疫記〉，《申報》，1911年第1張版4、5。

60 〈外務部招聘醫員除疫〉，《申報》，1911年2月16日，第1張版6。山東巡撫孫寶琦也在當地延攬「教會醫士」，另不惜重金向青島、廣州、香港，甚遠至柏林電聘西醫。〈山東巡撫孫寶琦奏籌辦防疫情形摺〉，《政治官報》，第1290號（1911年3月25日），頁10-13。

電吉林巡撫，不可擅減醫官與醫學堂學生的撫卹金額，一旦減少卹銀，將使醫官與學生觀望躊躇，辦事退縮。伍連德另電外部表示：此次吉撫傳出擅自調降身後撫卹金，醫官見後「爲〔未〕免令人心寒」，故期望仍照原章程辦理，否則「國家與連德之間，似有食前言之咎」。<sup>61</sup> 伍身爲此次防疫總指揮，極力爭取醫員應有撫卹。

疫情方熾時，傳出外國醫員病故，一度導致伍連德、英醫吉陞以及軍醫學生全體辭差請退，後經總督錫良多方勸慰之後才照舊辦事，爲求防疫人員不因疫症加劇萌生離意，他上奏希望「俟事竣後，在事出力人員照異常勞績保獎，先予立案，俾以激勸，以消災癘」，若染疫身死者按照陣亡例優爲撫卹，中央允錫良所奏。<sup>62</sup> 看來在防疫工作佈局上不單伍連德一人，外務部的支持與錫良的用心，皆能爲第一線防疫人員多加著想，對穩定抗疫士氣，助益甚大。

### （三）清廷捍衛防疫主權

雖說中日或中俄「聯合」防疫，但卻屢見日俄雙方各自行動，其中原因不難想像。日本覬覦滿蒙由來已久，特別是合併朝鮮後，加緊對東三省的經營腳步，「鐵路日夜趕工，兵備日夜整頓，商務則擴張益力」。<sup>63</sup> 故滿洲之經營，豈能毀於鼠疫之症，日人甚謂本次鼠疫爲「有史以來之大災厄」，<sup>64</sup> 以積極態度面對防疫，實不意外。1910年10月滿洲北部肺鼠疫甫流行時，即派滿鐵大連醫院院長安部仲雄前往調查，隨後升高滿鐵附屬地的防疫警報，展開火車、出入船舶檢疫的全面工作。<sup>65</sup> 隨著疫症蔓延擴散，更爲積極強硬的手段紛紛出籠。滿鐵方面爲免疫情順勢南下，防疫工作開展亦相當迅速。鼠疫擴散之原因，不少是華工在北方染疫後隨火車南下。對此滿鐵提出二項因應對策，包括暫停北方華工搭乘以及在各車站設

61 〈外務部電商防疫治疫員新章〉，《申報》，1911年2月16日，第1張版5。

62 〈疫氣蔓延人心危懼請俟事竣保獎出力人員摺〉，收錄於錫良，《錫清弼制軍奏稿》（臺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頁1265-1266。

63 〈時評·歲底年頭之外交〉，《申報》，1911年2月5日，第1張版6。

64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十年史》，頁811。

65 飯島涉，《ベストと近代中国—衛生の「制度化」と社会変容—》，頁187。

立大型檢驗所。<sup>66</sup> 滿鐵上述措施，可視為整體防疫工作的一環，錫良亦以哈爾濱鼠疫甚盛，照會滿鐵針對所有南下火車一概不准載客，滿鐵方面則禁止苦工乘車。<sup>67</sup> 其中關東軍駐紮地防疫更是嚴密，關東都督府與滿鐵所在地大連組織防疫總部，統籌規劃滿鐵、領事館與各機關、碼頭、進出口商等防疫支部，協調防疫工作，制定防疫標準作業流程，<sup>68</sup> 對日方迅速嚴密組建的臨時防疫組織，不禁讓《申報》稱大連「全埠殆成防疫世界矣」。<sup>69</sup> 此次防疫工作，日方經費支出相當可觀，大藏省除另編列100萬日圓特別預算外，<sup>70</sup> 關東都督府、滿鐵等機關動支近百萬日圓，當中尚未計入滿鐵停駛損失。<sup>71</sup> 由於東三省日俄勢力分據，各國基於自身利益立場所進行的防疫措施，中國方面若藉其力，攜手合作，對截堵疫情不無幫助，但其中分寸該如何拿捏，攸關中國衛生行政主權問題，若惡例一開，勢將難以挽回。

日方除了不尋常的軍事調動外，<sup>72</sup> 並藉機擴張檢疫範圍，干涉中國衛生行政。所持理由不外乎中國防疫辦理不善，疫症不獨為中國人民有害，於日僑生命亦有重大關係。駐奉天日領事經常擅派日警、日醫由日人居住之地及附近華人住戶，按戶實地查驗；或派兵監視中國屠宰場；或聯絡駐奉各國領事公同照會總督錫良，聲稱：「貴國如無防疫人員，各領事擬即自由遴員嚴防」。故錫良與地方交涉使趙國鈞除上緊防疫發條外，得與各國領事交涉聲明中國立場，不讓各國領事對主權有「越俎代謀」之機。<sup>73</sup>

除了實際行動外，日本方面欲藉由輿論來製造中日防疫的合理性。

66 〈滿州鼠疫記·大連〉，《申報》，1911年1月24日，第1張後幅版2。

67 〈北方鼠疫記〉，《申報》，1911年2月4日，第1張版6。

68 《南滿州鐵道株式會社社報》，第1170號（1911年2月7日），頁2-3。資料來源：「南滿州鐵道關係雜纂 社報 第二卷」，《外務省外交史料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藏，檔號：B04010956600。

69 〈北京鼠疫記〉，《申報》，1911年2月5日，第1張版5。

70 「御署名原本・明治四十四年・予算二月十六日・明治四十三年度特別會計歳入歳出予算追加」（1911年2月16日），《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藏，檔號：A03020918500。

71 Carl F. Nathan, *Plague Prevention and Politics in Manchuria 1910-1931*, p.28. 另據滿鐵統計，本次防疫經費共計260萬日圓，政府支出172萬餘圓、滿鐵86萬餘圓與各界捐輸1萬5千餘日圓。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編，《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十年史》，頁811。

72 Carl F. Nathan, *Plague Prevention and Politics in Manchuria 1910-1931*, p.32

73 〈東省防疫與主權之關係·奉天〉，《申報》，1911年1月26日，第1張後幅版2。

上述日本的種種舉措，皆錄自在上海發行的《申報》，顯示該報對日人的防疫工作深具戒心。日資創辦的《滿洲日日新聞》，則屢屢主張若中國防疫不力，日本得視情況在管理地域外「自由行動」；<sup>74</sup> 同為日資支持的《盛京時報》也大敲邊鼓，該報在1911年2月18日登載一篇來稿指出：中國官府在疫情爆發之初，處置失當導致蔓延，雖今賴東督錫良廢寢忘食投入防疫，但對疫情「回顧現時東省之財力，及國民智力之程度，更覺困難」，隨即話鋒一轉，認為不如借他國助力，以達防疫目的，若借外人之力「不但不見寸害，實可藉以紓焦眉之急」。<sup>75</sup> 確實，日本為此次防疫，南滿鐵道公司不僅投入鉅資，捐助清廷15萬兩防疫用費，<sup>76</sup> 但言「未見寸害」則係粉飾之詞，只消對照《申報》，不攻自破。

錫良雖不時向中央力陳外人干涉防疫，動輒干涉主權，應設法防範外，<sup>77</sup> 身處第一線的他，在資源取得與防疫網的需求下，曾表示清廷可與日本共同討論防疫問題。關東州當局曾拜訪錫良有意召開共同防疫會議，但飯島涉指出：日本此舉目的是在為設置日清共同防疫機關預作準備，根據日本外務省史料顯示，以奉天商務總會為首的民間力量，不僅反對召開日清防疫會議，甚至有可能以罷市來表達反對態度，<sup>78</sup> 日本駐南京領事也觀察到中國民間出現「日本將藉防疫，對我恣意妄為」的不滿聲浪。<sup>79</sup> 就連民間對日本的行動有所顧慮的情形下，錫良對於檢查戶口、鐵路及其附屬地以外的防疫工作，更向日方表達出未便干涉的態度。

勢力盤據東三省北部的俄國，同樣衍生防疫與主權的爭議。1911年2

74 飯島涉，《ベストと近代中国—衛生の「制度化」と社会変容—》，頁190-191。

75 〈中日兩國協同防疫之意見〉，《盛京時報》，1911年2月18日，版2。

76 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檢索系統，《德宗景皇帝實錄（九）（附）宣統政紀》，卷四十八，頁859-1。

77 〈日俄兩國在東省之舉動〉，《申報》，1911年3月10日，第1張版5。

77 〈奧租界防疫之交涉〉，《申報》，1911年2月15日，第1張版2。

77 〈外人干涉防疫種種·北京〉，《申報》，1911年2月18日，第1張版4。

77 〈論吾國今歲前途之希望〉，《申報》，1911年2月10日，第1張版2。

77 《申報》，1911年2月3日。

78 飯島涉，《ベストと近代中国—衛生の「制度化」と社会変容—》，頁192-193。

79 「帝国諸国外交関係雑纂／日支間ノ部 第一卷」（1911年2月14日），《外務省外交史料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藏，檔號：B03030210900。



月俄使照會稱：蘭河等地積屍情形嚴重，江河開凍之時，為保護俄境不受傳染，擬針對黑龍江來往船隻進行檢查，甚至中國船隻在境內碼頭往來亦在檢疫範圍內，俄國似乎有意藉機總攬邊境檢疫。對此外務部以事關主權侵越，連忙轉致總稅務司，待江河開凍後，隨即在松花江、黑龍江等處，凡國境內均令實施防疫檢驗章程；現時則選派醫員趕往辦理，毋使藉詞干預。<sup>80</sup> 外務部對防疫可能衍生出的主權糾葛，十分注意。3月，俄使再次照會外務部關於其所擬有關中俄邊境的檢疫規定，目的在針對進入俄境之華民，規定僅能由特定城市且經檢疫後方能入境，外務部對此並無意見，認為「似屬可行」，但對俄國擬於黑龍江右岸中國領土內開設3處檢驗所，以及於黑龍江、松花江口應設立檢驗所，並派衛港船檢查前往黑龍江之中國輪船及民船，則予嚴正回駁。外務部方面認為黑龍江右岸各地業已查明係屬中國境內，「中國政府自應注意酌量設立檢驗處所，以杜彼此傳染」，已飭知稅務司辦理檢疫事宜。<sup>81</sup> 在檢疫人員方面，清廷方面表示不排斥與俄國醫生進行防疫合作，但於照覆俄國特別言及「貴國境內擬設檢驗所諒可同時成立，中國醫官亦甚願前往協助」。此一措辭頗堪玩味，似乎在向俄國表示清廷能力處理檢疫工作，頗有你來我往的「較量」味道。外務部在照覆俄使廓索維慈（I.J.Korostovetz）來文中，總結有關防疫事務的交涉立場與底線：

良以華境華辦，俄境俄辦，總期邊界疫氛及早撲滅，庶於互相防範之中，仍不失各清界線之意。則貴國政府在中國境內設立檢驗處所之舉，自無庸再行提議。<sup>82</sup>

「華境華辦，俄境俄辦」，是外務部一貫地宣稱與主張，俄國基於防疫需要，深怕鼠疫藉由邊境或西伯利亞鐵路傳入境內，要求擴大檢疫據

80 〈外人干涉防疫種種·北京〉，《申報》，1911年2月18日，第1張版4。

81 「照復俄使黑龍江右岸各處檢驗所應歸中國自辦由」（1911年3月），《外交部門檔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檔號：02-31-001-06-002。

82 「照復俄使黑龍江右岸各處檢驗所應歸中國自辦由」（1911年3月），《外交部門檔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檔號：02-31-001-06-002。



點，但外務部則是顧慮俄國會有進一步行動。1911年5月疫症稍歇，吉林防疫局總醫官鍾穆生若干人等會同俄方官員，赴中蘇烏蘇里江邊界地帶進行調查時發現，先前鼠疫肆虐時，烏蘇里江一帶雖無疫症，但俄國邊境軍仍肆意槍擊前往互市的中國人民，並觀察到俄國近來復以哈爾濱發現二具屍體，「經醫博士薩普鑾尼驗明，確系疫症由蒼蠅啗人傳染等語，度其意似復欲藉此干涉我哈埠一帶之防疫」。<sup>83</sup> 這說明了清廷若無法於東三省建置完整防疫體系，俄國藉口插手防疫行政工作的疑慮將可能重演。

## 五、「萬國鼠疫會議」及其遺緒

1911年3月上旬，鼠疫稍歇，滿鐵公司陸續取消了對清國人搭乘限制與隔離措施，逐漸恢復通車，<sup>84</sup> 但緊接著清廷方面召開交織多重意涵「萬國鼠疫會議」。從後見歷史觀察點來看，清朝實已「窮途末路」，以當時中國整體醫學水準言，有何資格召開此一大會？舉辦的動機又是爲了什麼？飯島涉的研究指出，這場國際鼠疫會議的召開，乃是清廷感受到日本處理鼠疫的手段，嚴重干涉中國內政的強烈危機感而發，<sup>85</sup> 清廷便思透過將鼠疫防治問題國際化手段，壓制日俄雙方影響力。<sup>86</sup> 飯島涉見解深具啓發性，認爲此國際會議交織多重象徵意涵，不單只是總結防疫經驗的學術會議，同時在國際政治角力上有其特殊意義。以下將特別著重清廷與日本角力過程，思考這場會議帶給清朝政府的意義爲何。

清廷與日本早已爲防疫之事有所交鋒，萬國鼠疫會議實爲外交上另一個角力場。會議舉辦之初，一度傳出日人向國會要求舉辦萬國防疫大

83 遼寧省檔案館藏，「奉天行政長官公署檔案」，JC10.2338。轉引自飯島涉，《ベストと近代中国—衛生の「制度化」と社会変容—》，頁146。

84 「南滿州『ベスト』1件（6）」（1911年3月2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藏，檔號：C07090216300。

85 關東都督在1911年2月16日發給陸軍大臣的電報中表示不能袖手旁觀，「此際做出臨機處斷措施實屬必要，我以行政權干預乃不能之事，盼以紅十字事業來著手」。日方對於干涉中國管轄境內之防疫工作仍有顧忌，欲藉非官方組織紅十字會來處理疫症。「ベスト防疫の爲赤十字社衛生隊派遣の件」（1911年2月12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藏，檔號：C03023022000。

86 飯島涉，《ベストと近代中国—衛生の「制度化」と社会変容—》，頁193-194。

會，欲照會中俄英德法諸國派員與會研究除疫之法，<sup>87</sup> 顯示日本有意藉由舉辦萬國防疫會議，獨攬此次鼠疫的消滅之功。換言之，清廷在東三省的防疫努力與成果恐為日本收割，特別是滿鐵在此次的防疫過程中出力不少，亦有立場作如此宣稱。同時，日本十分擔心會議的各項結論，會對滿鐵在東三省的活動有所限制，因此早先對中國邀請出席萬國鼠疫會議不做回應，刻意阻撓。<sup>88</sup>

1911年此次齊聚國際一流學者的國際會議，何以最後仍由清廷出面在華舉辦，其中原委，尚無找到直接史料說明。若根據當時奉派治疫的施肇基回憶，則是當時以肺鼠疫無治療方法，乃建請外務部籌備「萬國治疫會議」。<sup>89</sup> 由施肇基事後回憶來看，似乎只是希望仰賴各國之力，共商防疫之道。不過，據伍連德的回憶，則透露出此會還有更深一層的意義。1911年3月疫情獲得初步控制後，施肇基拍了封電報告知伍連德，清廷決定於四月初於奉天舉行萬國防疫會議，並委由伍連德籌備此一會議，強調這可能是中國第一次在自己國內召開的國際會議，要伍妥為籌備。<sup>90</sup>

當時與施肇基一同在北京組織滿洲防疫處的顏惠慶則回憶說：「召集國際學術會議，在我國實為有史以來破天荒的第一次」。<sup>91</sup> 這不僅是清朝開國二百多年以來，第一次在國境內舉辦國際學術會議，且出席各國囊括當時醫學先進之國，計有美、奧、法、德、英、義、日、墨、荷、俄、中等11國專家學者與會。1911年4月3日會議正式揭幕，東三省總督錫良、駐奉各國領事、外務部右丞施肇基、中國衛生顧問、各國醫生、學者，與華洋防疫官員合計130人出席。

會議召開之初，仍有插曲。當時日本代表北里柴三郎<sup>92</sup> 對中國能在東

87 〈議設萬國防疫大會〉，《申報》，1911年2月12日，第1張版6。

88 Carl F. Nathan, *Plague Prevention and Politics in Manchuria 1910-1931*, p. 33.

89 施肇基，《施肇基早年回憶錄》（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67年），頁73。

90 Wu, Lien-Te, *Plague Fighter: The autobiography of a modern Chinese physician* (Cambridge [Eng.]: W. Heffer, 1959), pp. 39-42

91 顏惠慶著、姚崧齡譯，《顏惠慶自傳》（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3年），頁62。

92 北里柴三郎 (Kitasato Shibasaburo, 1852-1931) 為當時世界級細菌學大師。1883年，他從東京大學醫學院畢業，先到內務省衛生局服務，再於1885年12月以公費赴德國留學，到柏林的科霍 (Robert Koch, 1843-1910) 研究所學習細菌學。1889年是奠定北里聲名大噪的一年，他成功地培養出破傷風菌，研發

亞舉辦首次國際醫學會議深不以爲然，其言「東洋各國向未有萬國醫學會之舉，但此次中國偶遇好機會，提倡開會，而爲各國所贊成，尤可稱爲有極大之成效」；且北里在與會代表研商議程時，公開表示對召開此會，並認爲此乃中國有求於諸國，故不具主導議事之權：

此次之萬國會議因清國政府求鼠疫之豫防法及治療法，特求專門大家之研究，故清國當局就該會議性質上言之，無提出議案及容喙議事之權利，若有以上事實，余當峻拒之。<sup>93</sup>

北里宣稱日本在鼠疫研究學術與撲滅方法上至爲周密，各國想在日本之上有所創新，「實不可能之事也」。但施肇基則聲言，「此次大會純爲講求學術起見，全與政事無涉」加以回應，<sup>94</sup> 中日兩國在會場上的較勁可見一斑。施肇基曾回憶道：「日方代表（筆者按：北里柴三郎）以其聲望甚高，希望能任會長。余以各國與會之名士甚多，難免爭執，乃請政府簡派余爲「治疫大臣」，而由余任伍連德醫師爲會長」。<sup>95</sup> 由此看來，施肇基藉由清廷中央給予正式名分頭銜，先是確立官方身分，以免爲日本以國際專家「名士」身分取得主導權。後被各國推爲大會主席的伍連德，更發揮極高的政治智慧與技巧，推北里爲副主席，在23場次會議中，請北里主持了3場，<sup>96</sup> 用伍連德的話來說：「此善意有禮的舉動，促成長時間會議順利流暢地進行」。<sup>97</sup> 伍連德巧妙地化解了北里可能的杯葛，不但給足面子，敬重他在細菌學上的成就，使會議能順利進行，避免節外生枝。

爲期近一個月的國際醫學會議，對中國意義甚大。清末以來，中國派員參與各次「萬國」衛生醫藥會議將近40次，不少只是形式上派員參與，成效如何，實難得知，<sup>98</sup> 但此次在中國召開的會議，由實際負責防疫

出治療破傷風的抗毒素；但在鼠疫研究方面，北里一度宣稱首度發現黑死病菌，但最後承認誤判。王道還，〈科學史上的這一個月——一八九四年七月葉赫森、北里柴三郎公佈黑死病病原〉，《科學月刊》，第367期（2003年7月），頁76-79。

93 〈中國之名譽〉，《申報》，1911年4月8日，第1張後幅版2。

94 〈此會與政治無涉〉，《申報》，1911年4月8日，第1張後幅版2。

95 施肇基，《施肇基早年回憶錄》，頁74。

96 鍾金湯、劉仲康，〈黑死病鬥士—伍連德醫師（上）〉，頁886。

97 Wu, Lien-te, *Plague Fighter: The autobiography of a modern Chinese physician*, p 55.

98 筆者自中研院近史所典藏的清末總理衙門及外務部檔案中，特別自「各國賽會公檔」中輯出「醫藥」

工作的伍連德籌畫，邀集當時一流國際學者交換意見，總結當時世界上對於鼠疫的最新防疫與研究，會後出版專書，提供世界各國防治鼠疫的借鏡，為日後可能再度爆發的疫情預作準備。1920-21年海拉爾市再度爆發鼠疫，由於防疫體系業已建立，以及1910年處理疫症經驗，疫情迅速獲得控制，罹疫人數與死亡率已較1910年大為降低，<sup>99</sup> 並將疫情控制在長春以北。<sup>100</sup> 從政治外交方面來看這次會議，清廷也有所斬獲，當時世界各主要國家皆派員與會，不但提升了中國在國際科學界的地位，對外宣示中國有能力以西法來消滅鼠疫，可說是中國在公共衛生防治上的里程碑。對清廷的國際聲譽助益自不待言，可說提升了自義和團事變以來跌盪至谷底的國際形象。

清廷的作為並沒有隨著鼠疫平歇而停步，對「衛生行政」採取了更進一步的認識與作為。回顧清廷面對疫情之初，「因學術不如人，遂無事不求人，無物不仰給於人，耗財固也，即其不能自立之恥，雖挽西江之水，曾何以浣之？」輿論希望政府不能永遠處於被動應付的角色，應有更為積極的善後工作，對於醫師培養與藥學研究刻不容緩，以免防疫之權被外人所奪；另外則要設法普及衛生知識，使之家喻戶曉，防患於未然。<sup>101</sup> 鼠疫過後，以上意見逐一被落實中。外務部施肇基上書籌設中央醫院，平時作為研究醫術、藥物以供軍隊與人民使用，遭逢突發疫症時，不致束手無策，並免招致外人干涉。<sup>102</sup>

更為具體成果則見於伍連德在東三省的各項舉措。伍根據萬國鼠疫會議的決議，由東三省開始建立近代中國的現代防疫體系。<sup>103</sup> 1911年5月後，伍連德婉拒民政部衛生科長一職，依舊投入科學醫藥研究，當時他結

---

與「衛生」兩門的資料後發現：1880-1911的31年間，清朝政府總共接獲各國至少53次以上關於醫學、衛生、防疫等相關會議或組織的邀請，其中清廷派員參加39次，婉拒參加則有10次，情況不詳4次。由此看來，清廷對參與相關衛生醫學會議次數甚為頻繁，直至清朝覆亡仍參加不輟。「各國賽會公檔」（1866.8-1912.1），《外交部門檔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檔號：01-27-001-02。

99 Wang, Chi-min (王吉民), Wu, Lien-te (伍連德),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p. 433.

100 費克光 (Carney T. Fisher) 著、林玉梅、劉翠溶譯，〈中國歷史上的鼠疫〉，頁732。

101 〈論說：論衛生行政亟宜擴張〉，《盛京時報》，1911年3月7，版2。〈論說：防疫之善後〉，《盛京時報》，1911年3月24日，版2。

102 〈籌設中央醫院之先聲〉，《盛京時報》，1911年4月9日，版5。

103 Wu, Lien-te, *Plague Fighter: The autobiography of a modern Chinese physician*, pp. 375-376.

識哈爾濱當地稅務司英人華森（Haines Watson），華森與總稅務司安格聯（Francis Aglen）相善，伍連德透過此一關係，與安格聯有所接觸，希望能由哈爾濱稅關中撥出一筆款項籌設北滿防疫所，並於滿州里、哈爾濱、拉哈蘇蘇三處建立防疫醫院，倘若「一遇有疫症發現，及時前往診治，所有醫藥等費統由醫院籌辦，不另取之於商民」，民國以後，安格聯與北京外交團均允諾繼續自稅關撥款。另伍連德上奏盼清廷能撥款建成一座規模宏大的防疫局，以精益求精的態度「以為他處效」，<sup>104</sup> 特別是地處邊境附近的大黑河醫院，則因「大黑河地方與俄境內對峙，此次興修醫院，必較各處華麗，使足以壯觀瞻，稍涉粗俗，失中國局面」。<sup>105</sup> 伍連德應深切體認到，防疫除重效果外，若無具有一定規模的醫院，實不足與俄人一較高下。

在衛生行政常軌化方面，伍連德獲得外務部侍郎顏惠慶和東三省總督趙爾巽（1844-1927）的支持，東三省防疫處總部終落腳於哈爾濱，滿洲里、大黑河、齊齊哈爾、同江、牛莊均設有工作站，防疫機構的建置在辛亥革命爆發仍未中斷，繼續獲得南京臨時政府支持，並在哈爾濱成立東三省防疫事務總管理處，<sup>106</sup> 或為中國第一個近代防疫機構。就其以上措施，可發現因應鼠疫而生的防疫政策有其延續性，並非虛應了事；主其事者如東三省滿人總督錫良絕非守舊頑固之徒，他體認到了傳統中醫面對這波來勢洶洶的鼠疫似乎束手無策，他呼籲西方醫藥應當如「鐵路、電報、電燈和其他現代發明對這個國家的物質福利不可或缺」，<sup>107</sup> 值得注意的是，這樣的轉變不僅止於醫藥等層面，這次鼠疫中奉天、北京各設有防疫

---

104 山東巡撫孫寶琦（1867-1931）在鼠疫流行過後，希望能夠將先前籌設的防疫組織改組成為西醫院，他認為「防疫於臨時，不過治標之計，講衛生於平素，實為務本之圖」，盼能藉此災因勢利導「可研究新理，注重衛生」。這次鼠疫西方醫學在傳染病防治上的積極作用深深烙印在清廷官員心中。〈山東巡撫孫寶琦奏東省疫氣肅清擬創辦醫院請撥款並請獎出力各員摺〉，《政治官報》，第1270號（1911年5月23日），頁7-9。

105 「咨送籌辦北滿防疫院節略由」（1912年1月），《外交部門檔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檔號：02-31-001-06-011。

106 吳相湘，〈伍連德是中國近代醫學的先驅〉，《傳記文學》，頁50-51。

107 *The Lancet*, 1911年4月20日。轉引自費克光（Carney T. Fisher）著、林玉梅、劉翠溶譯，〈中國歷史上的鼠疫〉，頁721-722。



專責機構，並與商會、自治會等民間團體聯手對抗鼠疫，亦即在清末的制度改革中，將公共衛生透過國家行政手段加以「制度化」，展現如西方國家將衛生事業納入到國家統治行政的企圖心，<sup>108</sup> 確認公共衛生是國家的基本責任。透過這場鼠疫觀察清廷的表現，不禁懷疑清廷是否真如革命黨所描述如此顛預、迂腐？或許爲了革命所需，不得不做出的歷史評價與解釋，至今有必要再三斟酌思量。

## 六、結語

疾疫傳染不受國界之限，各國海港與跨國鐵路不僅便利商旅往來，同時是傳染病互通有無的場所，1910年於東三省爆發的鼠疫自不例外。複雜的是，對於此次鼠疫的撲滅與處理，不單是考驗清政府衛生行政能力，同時又牽涉到如何應付盤據東三省的日俄勢力。綜觀此次鼠疫撲滅過程，外務部方面早已深知日俄兩強欲藉保護僑民或該地利益，擴大在東三省的活動範圍，不時以中國方面防疫不力爲藉口，干涉衛生行政權，甚至侵奪中國主權。爲杜日俄兩國之口，清廷中央與外務部皆深切體認到不用西法難以遏止鼠疫，因此指派劍橋醫學博士伍連德爲東三省總醫官，借助西方醫士之力協助調查與防堵疫情；另一方面，我們也不可完全抹煞日俄兩國出於各自利益考量下所進行的各項防疫工作，例如伍連德在東三省從事防疫工作時，俄國中東路官員與醫生均予伍連德極大的協助，雙方有一定的合作關係。<sup>109</sup> 日本更是唯恐做爲帝國生命線之的東三省「淪陷」於此次鼠疫，因此不僅撥用鉅額防疫經費，同時滿鐵於鐵路沿線隨即展開檢疫、停駛等措施，東三省總督錫良也曾與日本共同商討如何協力防堵疫情事宜。中日協力防疫之外，各國也在靜觀垂垂老矣的清政府，是否有能力撲滅，特別是高聲吶喊「門戶開放政策」的美國尤其關注，美國深怕日俄在藉機擴張勢力，損及美國在東三省的利益。因此，清廷防疫能力牽動太平洋兩岸的美日俄三國勢力在東三省的競逐。

---

108 飯島涉，《ベストと近代中国—衛生の「制度化」と社会変容—》，頁143-165。

109 Wu, Lien-te, *Plague Fighter: The autobiography of a modern Chinese physician*, pp. 1-38



清廷大約花了四個多月大致撲滅疫情，其中的靈魂人物除過去研究不能不提的伍連德外，也不可忽視東三省總督錫良。從報章雜誌中，屢屢可見讚揚錫良的開明與迅速反應。<sup>110</sup> 伍能夠在東三省順利執行進行各項近代防疫手段，錫良在行政方面的調度與配合居功厥偉。錫良處理疫情的同時，對棘手的對外交涉也不能置身其外，並與外務部保持密切合作。在北京外交團的關切與施壓下，外務部與錫良能夠堅守防疫主權立場的條件，在於清廷的防疫工作表現得以取信於外人，關內外積極動員，落實防疫措施。這又與北京中央的開明態度與積極支持密不可分，整體而言，清廷此次防疫表現深獲外人好評。<sup>111</sup>

防疫工作並無隨著疫情趨緩而鬆懈，清廷在鼠疫平歇後，立即召開萬國鼠疫會議，破天荒在中國舉辦國際級醫學會議。此會對外宣示中國有能力以西方近代防疫措施來撲滅鼠疫，對於東三省主權捍衛上也做了重要宣稱。外務部在會議的籌備與安排上深獲各國好評，被推為大會主席的伍連德，不但巧妙地化解日本代表北里柴三郎可能的抵制與杯葛，也藉由此大會議奠定在傳染病學上的國際地位。伍連德與清廷在這次的鼠疫防治上的確表現不凡，這與吾人對於清末的刻板印象大異其趣，如何評價清末庚子新政也有重新考慮的必要。<sup>112</sup> 清廷留給後來的民國，不單只有各種包袱。從鼠疫防治看來，清廷也連帶開啓了近代中國衛生防疫機構的基本建置與雛型。

（責任編輯：黃翔瑜）

110 向來研究的焦點都將此次防疫的功臣放在伍連德上，但由當時的報紙卻發現，輿論對當時東督錫良評價相當高，各界輿論對於錫良此次在東三省的防疫工作都有相當評價。立場偏向日本的《盛京時報》亦稱「錫督籌備防疫事宜之認真」；《字林西報》盛讚東督防疫有功，孜孜矻矻，「躬率僚屬，實力奉行，其卓越之行，有口皆碑」；《清史稿》也給錫良清廉幹吏評價。《盛京時報》，1911年1月11日，版5；《字林報評讚東督（特）》，《申報》，1911年3月24日，第1張版6。趙爾巽等修，《新校本清史稿·列傳二三六·錫良》（臺北：鼎文書局標校本，1981年），頁125-35。

111 外報回顧此番疫症曾謂：「至於中國政府，於平日政策，多未盡適當，獨於北方救疫事宜，其佈置之完備，與對付之敏捷，一掃本來敷衍因循之惡習，實出人意料之外」。李廣誠，〈撲滅中國北方之瘟疫（譯自六月份美國世界大勢報）〉，《東方雜誌》，第8卷第8號（1911年8月），頁6-7。

112 朱鍇在一篇綜合性探討晚清中央機構的研究評述中指出，近十多年以來中國學界對於晚清中央機構的改革評價，隨著時間推移不斷提高。甚至有論者指出「除皇帝以外，這次改革為民國政體準備了所有東西」。朱鍇，〈晚清中央機構改革研究評述（1901-1911）〉，《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年增刊，頁131-132。

## 徵引書目

### （一）檔案・史料彙編

《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日本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藏）

C03023022000，〈ペスト防疫の爲赤十字社衛生隊派遣の件〉。

C07090216300，〈南滿州『ペスト』1件（6）〉。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日本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藏）

B03030210900，〈帝国諸外国外交関係雑纂／日支間ノ部 第一卷〉。

B04010956600，〈南滿州鉄道関係雑纂 社報 第二卷〉。

《国立公文書館》（日本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藏）

A03020918500，〈御署名原本・明治四十四年・予算二月十六日・明治四十三年度特別会計歳入歳出予算追加〉。

《外交部門檔案》（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

02-31-001-06-011，〈咨送籌辦北滿防疫院節略由〉。

02-31-001-06-002，〈照復俄廓使黑龍江右岸各處檢驗所應歸中國自辦由〉。

02-31-001-06-001，〈照錄彼得堡消滅瘟疫處辦法及是否延聘俄醫生在北滿所立檢驗所協同辦理由〉。

01-27-001-02，「各國賽會公檔」

03-19-022-01-002，〈奉省滿鐵附屬地華商貼用印花事咨覆查照由〉

03-46-029-24-002，〈論中東鐵路附屬地問題〉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北京大學、澳門理工學院編，《清代外務部中外關係檔案史料叢編—中西關係卷 第三集》。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

## 二、專書

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檢索系統，《德宗景皇帝實錄（九）（附）宣統政紀》。

王芸生編著，《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四卷）》。北京：三聯書店，1980年。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十年史》。大連：滿洲日日新聞社，1919年。

施肇基，《施肇基早年回憶錄》。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67年。

范燕秋，《疫病、醫學與殖民地現代性：日治臺灣醫學史》。臺北：稻鄉出版社，2005年。

飯島涉，《ペストと近代中国—衛生の「制度化」と社会変容—》。東京：研文出版社，2000年。

趙爾巽等修，《新校本清史稿》。臺北：鼎文書局標校本，1981年。

劉彥，《最近三十年中國外交史》。臺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民國19年版，1986年。

劉翠溶、伊懋可主編，《積漸所至：中國環境史論文集（下）》。臺北：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1995年。

錫良，《錫清弼制軍奏稿》。臺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

顏惠慶著、姚崧齡譯，《顏惠慶自傳》。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3年。

歴史学研究會編，《帝国への新たな視座》。東京：青木書店，2005年。

Carl F. Nathan, *Plague Prevention and Politics in Manchuria 1910-1931*, Cambridge: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distribut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Wang, Chi-min, Wu, Lien-te,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 Being a*

*Chronicle of Medical Happenings in China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Period*, Tientsin, China: Tientsin Press, 1932.

Wu, Lien-te, *Plague Fighter: The autobiography of a modern Chinese physician*, Cambridge [Eng.] : W. Heffer, 1959.

### 三、報紙

《民生報》，臺灣，2003年4-5月。

《盛京時報》，瀋陽，1910-1911年。

《申報》，上海，1910-1911年。

《政治官報》，北京，1911年。

### 四、期刊論文

〈論中國不講衛生之害（譯自日本九月份太陽報）〉，《外交報彙編》，第3冊。臺北：廣文書局，1964。

王道還，〈科學史上的這個月——一八九四年七月葉赫森、北里柴三郎公佈黑死病病原〉，《科學月刊》，第367期（2003年7月）。

安貴臣、杜才平，〈1911年國際防疫會議背景分析〉，《臺州師範學報》，第22卷第4期（2000年8月）。

朱鍇，〈晚清中央機構改革研究評述（1901-1911）〉，《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年增刊。

吳相湘，〈伍連德是中國近代醫學的先驅〉，《傳記文學》，第45卷第2期（1994年8月）。

李廣誠，〈撲滅中國北方之瘟疫（譯自六月份美國世界大勢報）〉，《東方雜誌》，第8卷第8號（1911年8月）。

杜山佳，〈萬國防疫會記〉，《東方雜誌》，第8卷第3號（1911年4月）。

姒元翼，〈防疫工作的先驅者—伍連德博士〉，收入哈爾濱市委員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哈爾濱文史資料（第三輯）》。黑龍江：出版者不詳，1984年。

林宇梅，〈伍連德科學防疫思想及其實踐〉，《民國檔案》，2004年4期（2004年11月）。

胡成，〈「不衛生」的華人形象：中外間不同講述—以上海公共衛生為中心的觀察（1860-1911）〉，《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6期（2007年6月）。

胡成，〈現代性經濟擴張與烈性傳染病的跨區流行—上海、東三省爆發的鼠疫、霍亂為中心的觀察（1922-1932）〉，《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1期（2006年3月）。

胡成，〈檢疫、種族與租界政治—1910年上海鼠疫病例發現後的華洋衝突〉，《近代史研究》，第160期（2007年7月）。

胡勇，〈清末瘟疫與民衆心態〉，《史學月刊》，2003年10期（2003年10月）。

區曉范，〈滿鐵附屬地與近代東三省城市空間及社會結構的演變〉，《社會科學戰線》，2003年1期（2003年1月）。

張偉男，〈東三省防疫處舊址與防疫泰斗伍連德博士〉，《北方文物》，第64期（2004年4月）。

陶文釗，〈日美在中國東北的爭奪〉，《世界歷史》，1996年第1期（1996年2月）。

焦潤明，〈1910-1911年的東三省大鼠疫及朝野應對措施〉，《近代史研究》，第153期（2006年3月）。

鍾金湯、劉仲康，〈黑死病鬥士—伍連德醫師（上）、（下）〉，《科學月刊》，第382、283期（2001年10、11月）。



